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126
国内邮发代号: 1-88
国外邮发代号: W4993
主管: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主办: 新华书店总店
协办: 中国图书馆学会

新华书馆报

CHINA LIBRARY WEEKLY

馆社之桥 人文之魂 阅读之美 书香之园



第570期

00 03-570

总第692期

2021年10月22日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第28期

02-03 业界动态

《鲁迅手稿全集》新书在国图首发

2022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12月1日截止

河南科技大学“域外汉学研究中心”开馆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陈列展”获国家文物局重点推介

天一阁与流散书籍访归中外学术研讨会举行

04 出版动态

《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研讨会文集》出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代登科总录》出版

《清华周刊》影印出版再现清华历史

05 编辑手记

全文数据库快速发展,传统图书目录仍有价值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编辑手记

06 书里书外

论天文学的起源

从《中国上古纹饰》引出的话题

07 图书推荐

《符号里的中国》

08 特别关注

《今注本二十四史》历经20余年已出版13部

本报顾问

谭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聂震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饶权(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
彭斐章(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吴慰慈(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本报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波(《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
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媛(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秘书长)

白雪华(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刘小琴(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刘兹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刘惠平(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
任竞(重庆图书馆馆长)
孙月沐(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朱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刘宇松(贵州省图书馆原馆长)
汤更生(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长)
肖维平(首都图书馆党委书记)
何光伦(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
吴晞(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

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
张久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书记、主任)
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李东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东莞图书馆馆长)
李学谦(中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主席)

李国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李勇(河北省图书馆馆长)
李玉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杨建忠(化学工业出版社社长)
杨沛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
邱冠华(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陈超(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陈锐(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陈传夫(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陈胜利(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

陈源蒸(中宣部原出版局研究员)
周云岳(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宗俊峰(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林鹏(科学出版社总经理)
林旭东(安徽省图书馆馆长)
范并思(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教授)
郑智明(福建省图书馆馆长)
倪晓建(首都图书馆原馆长)
柯平(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赵俊玲(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贾庆鹏(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
徐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徐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索传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郭斌(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主任)
顾森(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褚树青(浙江图书馆馆长)
蔡继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
霍瑞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魏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本报投稿邮箱

tushuguanbao@126.com

本报虚假信息举报电话

010-88361919

转载本报文章

请与本报联系并注明出处

《鲁迅手稿全集》新书在国图首发

本报讯 《鲁迅手稿全集》新书首发式不久前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鲁迅手稿全集》编委会主任胡和平，副部长、编委会副主任饶权，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出席首发式。

胡和平为《鲁迅手稿全集》新书揭幕并讲话。他指出，在各参与单位和来自全国各地百余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鲁迅手稿全集》得以精印出版，在鲁迅研究史、手稿学研究和出版史上均具有里程碑意义。鲁迅手稿是鲁迅精神的重

要载体，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珍贵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将全面再现鲁迅先生鲜活丰满的形象，展现鲁迅先生文学作品的精髓，让革命文学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风采。

饶权在介绍编辑出版情况时指出，各参与单位和有关专家充分吸收近年国内手稿学研究及鲁迅手稿收集、整理和研究的新成果，克服了诸多复杂繁重问题，圆满完成了新版《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出版，充

分体现了“全、精、真、新”的特点。希望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以全集出版成果为基础，持续加强鲁迅研究，大力推动鲁迅精神的时代阐释与社会传播。

《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出版工作于2017年6月正式启动，由中宣部指导，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项目实施4年来，国家图书馆联合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广州鲁迅纪念馆等收藏机构，以“收录内容更全面、编纂方式更科

学、印制效果更精美、出版形式更新颖”为目标，完成了全套78册共计3.2万余页手稿的精印出版。此次出版的全集分为《文稿编》《译稿编》《书信编》《日记编》《辑校古籍编》《辑校金石编》《杂编》等七编，较此前出版手稿增加逾14600页。

首发式上，胡和平、饶权、胡冰为鲁迅手稿收藏机构代表及鲁迅家属赠送全套《鲁迅手稿全集》。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及部分专家代表发言。

“书香门第·中国古籍文化展”在西安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西安崔振宽美术馆、西安市水墨长安艺术博物馆主办的“书香门第·中国古籍文化展”在西安崔振宽美术馆开幕。

展览展出中国古籍以及相关实物300余件160多个品种。古籍文化展在古城西安并不多见，此次展览吸引了众多对中国文化、古籍文化有着特殊感情的市民到场参观。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文明的足迹”，以中国书籍的发生、发展为线索，从商周时期记言记事的载

体甲骨、青铜器开始，到秦汉时期的石刻、瓦陶、竹木简、帛书，再到六朝、隋唐时代的手抄书，最后到唐末五代时期刻版印刷的出现，较为系统地呈现了中古时期的书籍文化脉络与时代特色；第二部分“书香四溢”是本次展览的重点，主要展示了从宋代至民国时期各种书籍的版本形式、印刷特色，用百余件古籍实物展现出了书籍作为知识传递的媒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演化及流变过程；第三部分为“敬惜字纸”，用“敬惜字纸”这个中

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现象，来展现古人在面对书籍文本时所持的“慎”之态度。

和很多艺术展览只能看不能动不同，“书香门第·中国古籍文化展”主办方鼓励观众自己动手做一页书，把书香带回家，让家也成为“书香门第”。

展览现场，除了陈列诸多珍贵的古籍善本的展区外，还有活字雕版展区，并举办了若干场科普性讲座、学术研讨会以及“中国古籍传统文化”主题公共教育等。

2022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申报12月1日截止

本报讯 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不久前决定组织开展2022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工作，以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切实推进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的顺利实施。申报材料须于2021年12月1日前报送。

申报单位须为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具有出版资质的出版单位，具备完成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条件和能力；申报项目须为古籍整理作品，整理对象应为1911年以前在中国抄写或刊行的汉文书刊、文献资料，以及出土的1911年以前以汉文文字为载体的文献资料，整理方式主要包括点校、注释、今译、影印、汇编、索引、书目等，研究著述不在申报之列；申报项目须已签订出版合同、具备80%以上书稿并列入2022年度出版计划，应在2023年3月底前如期出版。

此次申报重点为：1.公益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2.具有较高版本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传承价值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及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深度整理项目；3.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4.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5.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的项目。

深圳博物馆展出馆藏子部古籍善本

本报讯 “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子部古籍善本(上)”近日在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馆展览，将持续至12月5日。展览的主题为子部古籍善本，是继深圳博物馆举办经部、史部(上下)展览后推出的第4个古籍善本展，主要展示子部中的诸子、兵书、技术、丛书等书籍。

此次展览甄选深圳博物馆藏子部古籍98部(套)，以时间为叙事线索，分为“王道霸业”“道法自然”“守正出奇”“格物

致知”“汇纳百川”五个单元，内容涉及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程朱理学、兵法与武备、农医天文、西方传教士等，突出子部古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并有专门介绍古籍字体、版式、装帧、函套等内容，以加深观众对古籍文化的了解。

此次展出的最早古籍为明天顺四年(1460)刻本《朱子大全》，属宋闽本系统，为现存较早的明刻本朱熹全集。明嘉靖十二年(1533)刻本《世德堂六

子》、明万历赵用贤刻本《管子》《韩非子》是明代刻本中的精品，校刻精良。明代套印本则有万历四十八年(1620)凌氏刻《吕氏春秋》、万历闵氏刻《淮南鸿烈解》、闵氏刻《庄子南华真经》、天启元年(1621)茅震东刻《武经七书》，均朱墨套印，刻印精美。展出有多种丛书，如明嘉靖嘉趣堂刻本《金声玉振集》、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津逮秘书》等。另有《七省沿海全图》，图中标注有清代新安县的地理位置。

《安康史话》首发式暨阅读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方琛先生《安康史话》首发式暨阅读分享会”在安康市图书馆举行。

年过七旬的方琛系安康史志专家，主编、参编《安康地区志》《安康县志》《汉滨区乡镇志》等志书20多部，出版《秋实集》等文史作品专著、编著十余部。其新著《安康史话》创编五年，新近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康史话》从安康概况、沿革史话、战争史话、红色史话、人文史话、城治史话、经

济史话、物产史话、汉江史话、民俗史话、文旅史话、历代人物等方面介绍了安康自公元前312年至2010年的历史演变，记录了勤奋刚毅的安康人民在颠沛流离、拓荒垦殖、战天斗地的艰辛历程中，如何锤炼出坚韧不拔、勇于战斗、不怕牺牲的劳动品质和精神风貌，展示了安康上下数千年、纵横两万里之壮阔历史画卷。全书30万字，是一部严谨系统、资料丰富、简明通俗的综合性地方史册。

在阅读分享环节，安康学

院教授姚维荣、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谢开云对该书的史实与史话、特色与缺憾给予科学梳理；作家曾德强、柳庆康、龚仕文、蒋典军等人对其文史、阅读、收藏价值予以高度肯定。来自安康人周末读书会、王庭德书友会、小花公益读书会、博阅学社及安康市作家协会、安康市诗词学会、汉滨区文化馆、汉滨区少儿图书馆等阅读团队、文化团体的代表，表示要采用多种方式把此书读好、用好。

王庭德

河南科技大学“域外汉学研究中心”开馆

本报讯 10月10日,河南科技大学“域外汉学研究中心”在文科一号楼内正式开馆。人文学院院长罗子俊与域外汉籍收藏者秦晶晶女士共同主持了揭牌仪式。河南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漪,洛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宋文献,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原会长薛天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才智,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志民,洛阳市民俗博物馆名誉馆长王支援,著名画家寇衡,洛阳隋唐史学会会长王恺,河南大学、洛阳师范学院和洛阳理工学院的文史专家等30多人到场观

礼,共同见证中心的成立。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汉文化整体观逐步形成,域外汉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从2000年开始,南京大学、台湾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但是,在华夏文化之根的中原地区,还没有相关研究机构。河南科技大学“域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填补了这一空白。

揭牌仪式后,秦晶晶女士介绍了该中心收藏的近2000册和刻本古籍和近200幅日本书画作品。随后参加开馆仪式的专家学者进

行了座谈交流,座谈会由人文学院院长罗子俊主持。宋文献、薛天纬、陈才智、张志民、王支援、寇衡、王恺等专家学者进行了发言。大家认为,作为中原地区首个域外汉学研究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域外汉学研究中心”肩负着普及域外汉学、传播域外汉学、研究域外汉学的重任。“域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助于我们着眼于中日之间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以域外学者的眼光重新观照华夏文明与文化,从跨文化互动的视角重新认识域外汉学文献的学术价值,为进一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陈列展”获国家文物局重点推介

本报讯 国家文物局不久前公布2021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结果,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陈列展”获评重点推介项目。

自2015年起,由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项目征集推介工作,连续多年纳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年度重点工作,具有较强的行业引领示范作用和社会影响力。2021年度

主题展览项目征集推介工作启动以来,收到符合申报条件的展览项目307个,经专家评议、投票,确定100个展览项目为集中推介项目,其中前20项予以重点推介。“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陈列展”位列前20,充分体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较高的策展、办展能力和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力。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陈列展”位于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以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为线索,分为“厚德载物,与时俱进”“鉴古知今,汲取智慧”“学说纷呈,匠心天

工”“华章焕彩,翰墨流芳”四个主题单元,展现中国古代在哲学、思想、科技、文学等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展览精选文献80余种,重点选择未曾展出过、有重要代表性和历史文化价值、保存状况较好的典籍,其中61种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珍品,包括唐写本《辨亡论》、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传世孤帙宋内府抄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宋咸淳廖莹中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等众多国宝。

新闻速读

“《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湖北巡展系列讲座首场活动举行

本报讯 近日,来自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谢贵安教授以“永乐时代与《永乐大典》”为题,在湖北省图书馆为广大读者讲述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这场讲座是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湖北省博物馆承办的“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湖北巡展的系列讲座首场活动。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江讲坛共将在10月举办五场文化讲座,为“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湖北巡展拉开序幕。

天一阁与流散书籍访归中外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10月11日,天一阁与流散书籍访归中外学术研讨会在天一阁博物院举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沈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教授何义壮等20余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应邀出席,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就古今典籍流散问题展开探讨,并为天一阁海内外流散书籍访归工作出谋划策。天一阁藏书在巅峰时,曾多达7万卷。而在其后450余年的传承中,历经明清易代、《四库》征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及薛继渭盗书等种种劫难,不断流失,到1940年代曾一度仅存13038卷,不足五分之一。本次“天一阁海内外流散书籍访归工程”的访归重点,将采用“数字归阁”形式,用高清摄影技术将古籍数字化,使流散书以另一种形式回归天一阁。

《滨州市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开始执行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滨州市政府同意市文化和旅游局《滨州市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自10月1日起执行。《滨州市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指出,地方文献是反映特定区域内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沿革、发展和现状的历史资料 and 现实资料的总和。它是记载一定区域内自然、社会和人群存在、发展变化及影响的特定文献,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同时还具有资政、励志、存史的重要价值。为了传承优秀地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滨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国家、山东省有关法规政策,特制定本制度。该制度对呈缴本的范围作了具体说明。

宁德市政协主席调研闽东畲族文献资料中心建设项目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宁德市政协主席兰斯琦调研闽东畲族文献资料中心建设情况,市政协副主席黄家盛参加调研。在闽东畲族文献资料中心,兰斯琦仔细观看了中心整体环境、文献资料展陈布局等,认真听取相关人员对中心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与市文旅等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就下一步工作重点、优化场馆布置、文献资料搜集、分中心设立标准等提出意见。兰斯琦对畲族文献资料中心建设进展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继续做好畲族文献资料的征集工作,主动面向全国45个畲族乡所在县份征集畲族相关典籍资料,重视发挥畲族同胞和各界人士力量,采取捐赠、购买、借用等方式,收集类别更多、质量更高的文献资料。

砀山县图书馆 红色古籍珍藏馆开馆

本报讯 10月1日,安徽省砀山县图书馆之红色古籍珍藏馆进行适时免费开放,让广大读者与古籍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

砀山县图书馆红色古籍珍藏馆,位于砀山县图书馆负一层,是该县唯一一处涉及古籍珍藏、展示红色古籍的场馆。2021年初,砀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经过前期抢救性发掘,并由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委派专家组对馆藏古籍进行实地普查督导,对馆藏古籍及线装书进行统一整理编目,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上完成著录,使馆藏古籍重获新生。

目前该县已整理出各类线装书154部421册,其中1912年前刊刻的古籍共138部350册,年代从清至民国,涉及人文、教育、社会、科技等各类学科,集中展示和体现砀山文化传承和历史沉淀,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目前,砀山县图书馆正在积极征集能够反映本地特色的古籍文献,相关工作也将持续展开。未来,砀山县图书馆将会加强对古籍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让古籍在新时代焕发新的色彩。

书法家高式熊家人向宁波图书馆捐书1.5万册

本报讯 10月11日,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高式熊的女儿高定珠将父亲留下的15000余册(件)藏书与文献无偿捐赠给宁波图书馆。“这些书都是父亲的朋友送给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份情谊。现在由宁波图书馆来接受这些书,让它们回到宁波来,我觉得是最好的归宿。”同时,“四明高峰——高式熊先生诞辰100周年生平展”在宁波图书馆揭幕。

高式熊(1921—2019),著名书法家、篆刻家,浙江鄞县人,本名廷肃,字式熊,号采苓、羽弓,后以“红葵花馆”为斋名。他幼承家学,从小由他的父亲晚清翰林太史高振霄亲授学问,在书法篆刻上得赵叔孺、王福庵、张鲁庵等名家指点。其书法出入矩,端雅大方,诸体皆善,尤精篆书;其印以赵、王为根基,由技入道,成一家之格。高式熊生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民建书画院院长、棠柏印社社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18年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书法家”荣誉称号。

有《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式熊印稿》《茶经印谱》等书法篆刻著作传世。

2019年,高式熊去世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书期刊和手稿文献资料,高定珠决定将它们捐赠给宁波图书馆,落叶归根,造福桑梓。2021年正值高式熊诞辰100周年,宁波图书馆特举办“四明高峰——高式熊先生诞辰100周年生平展”,以此深切缅怀他的艺术人生,弘扬他的乡梓情义。

本次展览分为“四明高人”“艺海问津”“印记人生”“传道游艺”“一片冰心”五个板块,全面展示高式熊一生对艺术的痴情、对公益的热情、对故乡的深情。实物展品包括高振霄的手迹、画像,高式熊生前使用的书桌座椅、书法用具以及收藏的老报刊,孙晓泉、韩天衡、童衍方、叶辛等友人后辈的签赠图书,高式熊捐赠给宁波图书馆的图书等。



《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研讨会文集》出版

本报讯 《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研讨会文集》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一周年，国家图书馆建馆111周年。75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在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中华典籍文献守护者的中国图书馆人和各界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抢救保护中华民族的珍贵典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辞艰辛，不避险阻，冒着枪林弹雨，历经风霜雨雪，辗转大江南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华典籍和传统文化抢掠破坏的

历史罪行，纪念和学习抗战时期前辈同仁抢救保护典籍的感人事迹，继承他们爱国护书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为此，2015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面向全国图书馆界征集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重要事例，召开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在全国图书馆界和文献保护界引起了很大反响。5年来，在有关抗战时期抢救保护典籍文献的研究中，又陆续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新成果、新进展。2020年7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再次开展抗战时期抢救保护典籍文献重要事例征集工作，并于同年9月4日召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全

国图书馆和各省古籍保护中心的积极支持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12家单位的21篇文章。研讨会当日，国家图书馆和部分省级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专家学者、新闻媒体记者等40多人在国家图书馆会堂共同研讨并发布多个抢救保护典籍文献事例。这是我国图书馆界再次全方位、多角度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破坏中国文化典籍，展示我国仁人志士抢救保护珍贵典籍文献的重要活动。为满足公众需求，现将与会文章集结出版，以飨读者。

本论文集收录的文章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增加了抢救保护典籍文献的事例。详细讲述了抗战时期合众图书馆等先贤抢救保护典籍文献、八路军抢救保护《赵城金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梅冷生抢救温州重要典籍文献等伟大壮举；介绍了央视纪录频道首播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的制作缘起。

二、发现并补充了新史料，展示了研究新成果。如揭示了郑振铎抢救典籍文献的新史料；丰富了抗战期间王重民在美国抢救和整理中华典籍文献的历史细节。

三、把抗战古籍保护扩大至抗战文献保护范围，使得框架结构更加丰满。如增加了对抗战文献资源库、抗战主题记忆资源建设和民国时期抗战文献保护整理研究与开发的介绍等。

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了解到抗战炮火下中华典籍饱经战乱的多舛命运；感受到图书馆前辈同仁舍命护书，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所建立的伟大功勋；为当代图书馆人在保存、挖掘抗战文献资源所做出艰苦努力鼓与呼。同时，也希望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由此了解历史，主动参与到保护中华典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中。这对于推动抗战史料收集整理、促进中华典籍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本次抗战时期抢救保护典籍文献重要事例征集等工作亦是在抗疫期间组织开展。参与工作的相关领导、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克服诸多不便，对此项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代登科总录》出版

本报讯 近日，《明代登科总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重点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明代登科总录》从浩瀚的现存文献中辑录出明代276年89榜24000多名进士传记资料，撰写小传，包括字号、籍贯、登科年、初授官、所历官及终任官、谥号等信息，小传之下，详细罗列相关书证，注明文献出处。全书按89榜榜次顺序编排，各榜前三名列该榜之首，第四名起按姓名笔画顺序排列。书后附《姓名笔画索引》，以便查检。

全书总字数1400余万，是空前的明代进士数据大普查、大呈现，相较于现有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同类书稿有较大的修订、增补，其为每一位进士撰写小传、罗列详细书证，是作为基础性资料最具特色的价值，是对同类书稿学术信息容量的极大提升，为全面、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但有助于推进明代科举史的深入研究，也将为明代政治史、教育史、文化史、人才学与区域研究开拓新的视角，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认为：作为《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之一的《明代登科总录》，是继《宋代登科总录》之后的又一浩大的学术出版工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尽最大努力和一切可能，利用了明代第一手科举文献资料。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路育松则这样评价这套书的出版：《明代登科总录》的面世，将为《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再添新篇章，使中国历代登科情况日渐清晰，为研究明代科举、官制等提供了详实的一手资料，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深化对明代精英分类、社会分层及流动、科举与地方文化教育及经济状况等问题的探讨，大大丰富我们对明代政治史、教育史、科举学、人才学、人文地理学、区域史等多个领域的认识，具有填补空白、助力研究的极高学术价值。

《明代登科总录》属于《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中的一种。《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旨在担当起为中国科举史研究打下基础的艰巨任务。全书根据现存古籍与新出土文献，收录自隋至清1300年间科举考试录取的登科人，总人数将达12万人，总字数达3800万字，是迄今为止，国

内外规模最大的关于中国古代人物的传记资料，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科举研究第一大工程”。全书按隋唐五代、宋代、辽金元、明代、清代五个部分分为五卷。其中《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已出版。这两卷均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隋唐五代登科总录》也已经启动，正在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所运用的书证资料，均出自第一手文献资料，具有翔实可靠的权威性，能够为我国古代文、史、哲研究开扩视野，提供较全面的自隋唐以下的中国古代文化精英的传记资料，有助于推进文、史、哲专门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撰编与出版，将为科举史研究提供最基础的科举人物数据库和资料，有了它，历代登科科目及其登科人数的变化，进士的地理分布，科举与地域经济，科举与地方文化教育等等研究，将得以铺开。

赵艳芳

《清华周刊》影印出版 再现清华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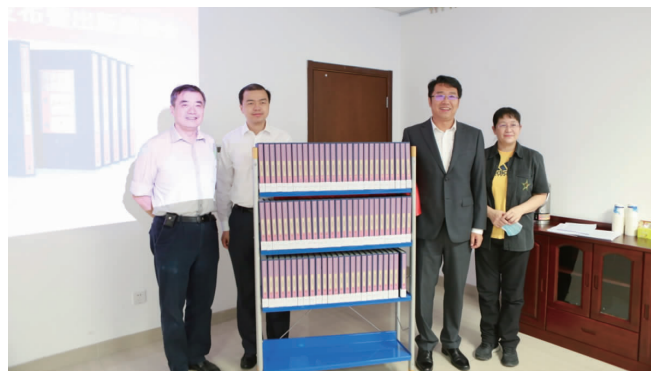
本报讯 近期，作为“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重要成果的《清华周刊》正式影印出版，这是2019年由清华大学图书馆申报并获得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立项资助的整理出版项目，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

近日，《清华周刊》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出席并致辞，他介绍了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希望学界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掘《清华周刊》的学术研究价值。

《清华周刊》影印出版80册，共计693期。《清华周刊》创刊于1914年3月24日，是一份由清华学生主办的刊物，原名《清华周报》，1914年9月22日改名为《清华周刊》，1947年9

月25日被列入禁刊，停止发行。内容有言论、译丛、文苑及校闻等，承载了清华23年的历史（1937年1月-1947年1月），是清华大学校史历史的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学生刊物之一，是后人修校史的重要依据；还是了解老清华的教育思想，追溯学术大家成长史，乃至研究民国时期中国教育、文化、思想状况的重要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2012年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自2013年起面向全国组织申报民国时期文献出版项目，依托全国文献收藏资源，对民国时期文献进行有计划、分步骤、成规模的整理出版，带动了全国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的开展。截至2021年6月共立项308项，完成125项，出版图书7624册。



全文数据库快速发展,传统图书目录仍有价值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编辑手记

□赵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 陆续出版

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也为了摸清家底,为民国文献抢救打下基础,2011年,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内文献收藏单位,策划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得到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大力支持。项目自2012年启动以来,在各级图书馆的积极参与下,在学界专家的热情支持下,文献普查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2015年2月,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为展示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让学界尽早共享,启动了《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编纂工作。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主要收录1911年至1949年9月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基本依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体系,按学科分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总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语言文字等18个分卷。其涵盖的收藏单位近60家,所收录的图书数据预计有20余万种,可以说是现阶段收录民国图书数据最多的目录。

2018年,《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的“哲学”卷出版;2019年12月,“社会科学总论”卷出版;2020年,“自然科学(基础科学)”卷及“农业科学”卷相继出版;2021年,“宗教”卷完成出版。截至目前,该系列图书已出版5卷,著录书目数据2万余种。

上世纪80-90年代,我社曾出版过一套《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图书12万余种,是当时最优秀的综合性书目之一,时至今日,该书的编印质量依然广受好评。由于条件所限,这部书目主要收录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藏书,收录范围和数量存在一定局限。

凭借全国范围的民国文献普查、成熟的组织协调体系、专业的编纂团队、现代化的目录搜集处理程序、便捷的图书数据库等,《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在继承《民国时期总书目》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大突破。主要体现在收藏单位的代表性、书目数据的完整性、著录内容的准确性三个方面:

(一) 收藏单位的代表性
《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借

助全国范围的民国文献普查,扩大了收藏单位范围,收录了全国几乎所有省级公共图书馆的民国文献数据,吸收了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的主要高校成员馆,以及一些地市级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各类民国时期文献主要收藏机构的数据。截至2018年4月,《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的文献收藏单位已经近60家,而《民国时期总书目》主要收录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三家单位的数据,因此《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在所覆盖的收藏单位数量和代表性上都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总书目》。

(二) 书目数据的完整性

由于吸纳的收藏单位范围广泛,《民国时期图书总目》所收录的数据量预计有20余万种,不仅比《民国时期总书目》的12万种数据增加一倍,也将是现阶段收录民国图书数据最多的目录。《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编者曾做过对比工作,以“哲学”卷为例,本次著录数据4830种,其中有1200多种是《民国时期总书目》未著录的。同时,随着各单位编目的不断完善,以及线上丰富易查的图书书影,《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在每种数据的著录内容上也更加完备,能更好地反映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概貌。

(三) 著录内容的准确性

在保证内容的准确性方面,我社的《民国图书数据库》发挥了巨大作用。该数据库五期收录图书20万种,书目信息著录准确,书影收录完整,总计3500万页,全部图书实现全文检索,可检索的字数超过100亿字。编者在审校阶段、责编在编辑审校阶段都充分利用了这个数据库,查核使用非常方便,发现并解决了不少之前的著录错误,使得本次《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在著录内容的准确性上也前进了一大步。

相信《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各卷书目的出版面世必将对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有重大参考价值,对民国时期文献保护等诸多领域也会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传统图书目录 仍有价值

此次新编的《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哲学”卷等5个分

卷出版后受到了许多好评。不过,我们也听到一种声音,他们认为已经有囊括海量书刊的全文数据库,随时随地方便检索,制作传统的图书目录可能已经没有必要;而且纸质图书一旦出版就难以修改,与数据库的及时更新相比,更是高下立见,做纸质目录反而浪费资源。

全文数据库的制作是近年数字资源开发的大趋势,发展迅速。比如上文所介绍的我社《民国图书数据库》,收录20万种图书,3500万页书影,可检索的字数超过100亿。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在全文数据库快速发展的时代,编制传统的图书目录还有没有价值?

我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各类古籍目录和民国图书目录,说实话,最开始听到这样的议论时,也觉得惶恐。不过,当静下来,认真思考这些目录存在的意义,我反而意识到它们具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依然拥有很强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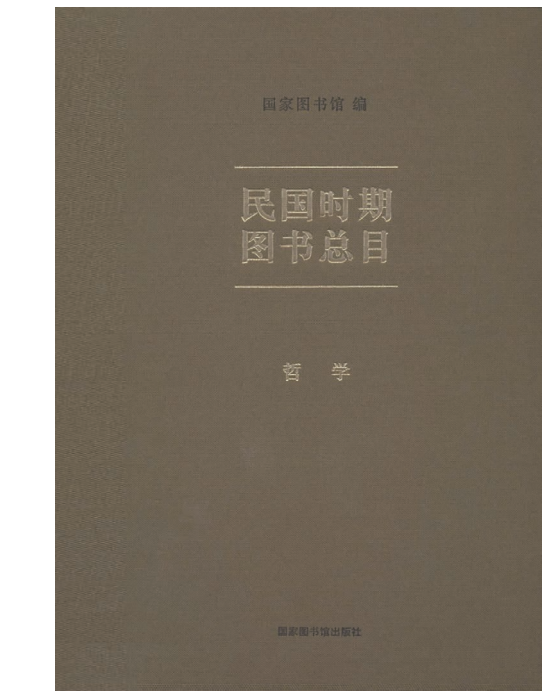
专业人士的读书心得大概都有这么两条:阅读正文之前要先看目录,了解该书的大纲框架,体会作者的创作逻辑;参考文献不能忽视,若想深入研究该书的相关知识,那么首先根据作者精挑细选的参考文献进行研读,就是二不二的选择了。

一本书的目录和参考文献尚且如此重要,那么一个学科、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图书目录,它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个人认为传统图书目录主要有以下几个优势:

一、知识地图

高质量的传统图书目录,就像巨人的肩膀,读者站在上面,即可以领略全部知识的风采。它们有科学、准确的分类,便于读者形成对某领域知识的整体认知,是入门的基础。拿“哲学”卷来说,它给读者呈现了整个民国时期哲学类图书出版的概况,通过多级类目,将民国时期哲学类图书的轮廓、框架、枝脉、细节,递次清晰展现,是读者学习和研究的绝佳指引,可以说是一份全局性的知识地图。

我们对全文数据库等数字资源的使用,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传统图书目录便于从大处着眼,数据库擅长解决具体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个大不同。



二、效率利器

全文数据库的一大优点是它的“博”。不仅广收数据,还配有全文书影,并且不断更新壮大,使读者不出门便可查天下书。

传统图书目录在数量上没有优势,不过它的优势在于“精”。正是因为容量有限、难以修改,所以最终出版的目录在数据条目的取舍上剔重合并,在著录内容的选择上去粗取精,最大限度避免无效信息,同样有效节省读者时间。

全文数据库的“博”,可以完美胜任查找检索任务;传统图书目录的“精”,则为了解概况、初学入门提供最优路径。

三、研究入口

若想要到全文数据库中搜索捕捉信息,首先得知道检索词,不然再庞大的数据库也是无从下手。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传统图书目录纲举目张,内容高度集中,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入口,是创意想法萌生的沃土。翻开“哲学”卷,既可以对民国时期哲学文献出版特点进行综合性研究,还可以对每一个小类目进行专题研究;可以对一本书、一个作者进行深入研究,也可以做几本书、几个作者的横向比较;可以从出版的方向论述一本书的出版史、一个出版机构的变迁,也可以分析不同时期出版内容的侧重。“哲学”卷能提

供的学术指引,不胜枚举。

全文数据库检索方便,是学术发展的加速器;传统图书目录提供多重入口,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二者各有所长。

新时代,新挑战

全文数据库等网络资源飞速发展,传统图书目录的出版形势更加严峻。数据量要更全面、更充分,内容要更准确、更严谨,分类要更专业、更细致,这都是传统图书目录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只有满足了这些需求,它才能更好地在数字时代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数字时代给传统图书目录带来了这么严苛的生存环境,传统图书目录也可以反过来驯化时代,跟随时代趋势,与数据库等数字资源有机结合,实现1+1>2的超越,为学术研究提供更高效的服务。

或许,有一天数字资源技术的高速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紧密关联,使数字资源完美融合传统图书目录的长处,真正实现无书胜有书。

我们对技术发展充满期待,不过巨变不是一夜完成,我们能做的、应该做的就是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好目录、好图书、好产品,并不断精进。如此,我想我们不会掉队,好产品永远不会被抛弃。

查理·芒格说:“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与同道共勉。

论天文学的起源

从《中国上古纹饰》引出的话题

□赵永恒(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收到王先胜寄来的《中国上古纹饰》的书稿,仔细阅读之后,我不由得想起钱穆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那是1990年,钱穆已经是96岁高龄。文章中的一段话是: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王先胜写的两部关于纹饰的书正好是钱穆所说的把“天文”和“人文”结合起来的例证。

作为天文工作者,我一直对天文学史很有兴趣,当然很关心天文学的起源问题,也阅读过很多中外天文学史的书籍。由于中国的史学传统,有二十四史的正史和更多的史料,大家都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体系建立于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或者是汉代。那么,中国天文学的源头在哪里,形成于何时,则众说纷纭。特别是在20世纪,受到“疑古派”和“言必称希腊”等思潮的影响,对于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结论往往是谨慎而低估的。

我在当时也是接受这类说法的一员。然而,到了2003年,我开展虚拟天文台的研究时,就考虑将各种天文使用现代天文学方法计算出来,以供其他学者所使用。首先是让学生把“五星连珠”的天象计算出来,时间跨度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3000年共6000年的时间。结果发现古代文献记载的颛顼“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这个天象在数千年里有唯一的时间:即公元前2807年2月26日,这使得我对中国古人记录天象的真实性信心大增。

我觉得,既然利用天象能够确定远古时代的年代,那就需要找到这些年代的旁证,如古代文献的记载,如考古学方面的证据等。为此,那时我在网络上积极参与中国古史的讨论,从而学习和积累了相关的知识。就在那时,我在网络上结识了王先胜,我们通过网络开展了讨论,后来王先胜将讨论的内容集结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通信》,放到网络上。我们两人还在2005年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黄帝年代之历法钩沉》,依据古代文献中黄帝年代的有关历法记录来进行计算分析,认为黄帝的年代应该始于仰韶文化前期,而这与考古学结合其他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在以后的10多年里,我对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各类天象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传说时代的帝王年代如下(以历法或天象的年代为准):

燧人氏:公元前15000年左右
伏羲:公元前8217年
28宿起源:公元前5670年左右
炎帝:公元前4951年
黄帝:公元前4377年
颛顼:公元前2807年
帝喾:公元前2445年
尧:公元前2114年
舜:公元前2077年
禹:公元前2049年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工作将中国天文学的起源时间大大提前。正如2001年伊世同在《星象考原——中国星象的原始和演变》中指出的:“现有的多种迹象表明,涉及中国传统星象的探索研究,面临着—场极为重要的历史性全面突破。”“作为中国经典天文学的星象背景,其原始年代不会晚于六千年前,其上限可达万年,比过去学者们的谨慎论证提前了一倍。”

将中国天文学起源向前大大推进的因素主要来自于考古的发现,如20世纪考古发现的33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240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图,21世纪考古发现的4100年前的襄汾陶寺观象台和最近发现的5300年前的郑州“河洛古国”北斗九星。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到科学发展历史时,他就指出: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这里,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科学的开端是天文学,而天文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的进步。在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天文学用于“观象授时”,指导社会生产和生活,并形成了一套历法的体系,从而确定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数学则用于历法的“推步”,根据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来推算各种各样的天象。比如被古人推崇为“历祖”的黄帝,《史记》中记载:“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这就是“十九年七闰”的历法规则。由此,天文学发现的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转化为历法体系中的规则和方法,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数据,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象”和“数”。

《周髀算经》记载:“故月与日合,为一月。日复日,为一日。日复星,为一岁。外衡冬至,内衡夏至。六气复返,皆谓中气。阴阳之数,日月之法。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部,七十六岁。二十部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岁。七首为一极,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生数皆终,万物复始,天以更元作纪历。”其中给出的历法数据是:

1章=19岁=235月
1部=4章=76岁=27759日
1遂=20部=80章=1520岁
1首=3遂=60部=4560岁
1极=7首=21遂=31920岁

在这些历法数据中,历法起始日是朔日冬至,经过19年(1章),其中需要置闰7个月,朔日和冬至基本上在1天之内(因日数有余分)。经过76年(1部),则朔日和冬至在同一天,其日干支与起始日相同,如历法起始日是“甲子日朔冬至”,则1遂后也是“甲子日朔冬至”。经过4560年(1首)后,年干支也相

同,如历法起始日是“甲子年甲子日朔冬至”,则1首后也是“甲子年甲子日朔冬至”。因此,4560年的“1首”是“年”(太阳)、“朔”(月亮)、“日干支”(60天)和“年干支”(60年)完整回归的历法周期。中国古代历法不但包括太阳和月亮的运动(即阳历和阴历),还包括“水、金、火、木、土”五星的运动。先秦时期测得木星的回归周期是12年,土星的回归周期是28年。“1首”4560年的历法周期是包括了木星的回归周期,而“1极”31920岁方能包括土星的回归周期。

我这里罗列了《周髀算经》中的一堆数字,是想说明在历法中出现的各种天象,其背后的运动规律是以数来表示的,这就是“象”和“数”的关系,也是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如前所述,1天1夜为1日,太阳与月亮重合为1月。1年分4时,即春夏秋冬四季。4时分八节,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8个节气。1年有12个月,19年7闰,即闰年时1年有13个月。还有干支纪日、干支纪年,包括10天干、12地支。还有木星的12年周期、土星的28年周期。还有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运动轨迹,即28宿作为星空的标记点。如果将这些数字排列一下,就有2、4、8、10、12、19、20、21、28、60、76、80,还有与其相关的数字,等等。

这些数字在古代文献资料中有明确的记载,甚至在考古中的文字材料也有出现。而现在,通过王先胜的研究,在我国上古时代甚至是远古时代的纹饰资料中也出现了,充分说明了我国天文学的起源甚早,其上限可以认为是2万年前。

《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路史》记载伏羲“稽央象,肇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文籍由是兴矣”。这些文献说明在1万年前的伏羲时代,就发明了“书契”(即早期图画文字),用以取代过去的“刻木结绳”的管理办法。百官用书契来治理,万民用书契做交流,从此开始有了文化的发展。王先胜所研究的古代纹饰,应该就是古人所称的“书契”。

王先胜在《中国上古纹饰》中,“通过详尽地分析器物纹饰的构造、来源及其本义,认为中国古代纹饰(新石器时代—秦汉)是类似于文字文献的另一种文化传播、传承符号体系。其主要文化内涵就是与古代天文历法、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有关的知识、观念和信仰”。王先胜对古代纹饰的研究充分说明天文和人文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也证明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观点,他曾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当然到了后来还有“仓颉造字”的文字发明,又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文明的发展。如在41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中考古发现了朱书“文”“尧”二字和骨相刻文“辰”字。

值得指出的是,王先胜的研究特别强调了在古代纹饰中体现的思想和文化是从远古贯通到上古,甚至直到秦汉时期。这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悠久性、持续性和兼容性的特点。我在研究圭表测影时,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圭表测影是用来确定年、季节和节气的,甚至用来确定“地中”。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出土了公元前2100年的圭表。而从公元前2042年“禹都阳城”、公元前1035年“周公卜洛”、公元前511年的《周髀算经》,到公元前51年的



刘向在洛阳测影,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采用的是同样的测量方法和相同的盖天模型,但在不同的时期则是针对当时的北极星进行测量的,可谓是有“常有变”。

我想,王先胜的这两部关于古代纹饰研究的著作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如天文观和人文观,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最后,我以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朝闻道》中的一段故事来做结束,他的这部小说也是在2001年发表的。

“这个原始人仰望星空的时间超过了预警阈值,已对宇宙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到此为止,已在不同的地点观察到了十例这样的超限事件,符合报警条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前面说过,只有当有能力产生创世能级能量、过程的文明出现时,预警系统才会报警。”

“你们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文明吗?”

人们面面相觑,一片茫然。

探险者露出那毫无特点的微笑说:“这很难理解吗?当生命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时,距它最终解开这个奥秘只有一步之遥了。”看到人们仍不明白,他接着说,“比如地球生命,用了四十多亿年时间才第一次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但那一时刻距你们建成爱因斯坦赤道只有不到四千万年,而这一进程最关键的加速期只有不到五百年时间。如果说那个原始人对宇宙的几分钟凝视是看到了一颗宝石,其后你们所谓的整个人类文明,不过是弯腰去拾它罢了。”

(赵永恒: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科学工程LAMOST项目总经理,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主要从事活动天体的理论研究、高能天体的观测分析、多波段观测、数据分析技术、天文年代学研究以及LAMOST项目的科学研究和管理等工作。参加和主持过“攀登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工作;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15篇。1997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1999年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2000年获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符号里的中国》

100 多个符号,近300幅彩图,浓缩5000年中华文明



赵运涛著, 中华书局2021年7月, 定价:78元

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富有象征意味和审美价值的符号。本书选取传世文献、考古发掘和民间信仰中最能代表中国的100多个符号,如龙、凤、鸿蒙、祝融、太极图、八卦图、河图洛书、三星堆“太阳—神鸟—神人—神树”等,分为祥瑞、守护、神圣、人文四辑,对每个符号的生成过程、发展流变、现今影响、寓意与应用作了细致的考辨,辅有近300幅彩图,将文化中国的来龙去脉与核心精神娓娓道来。懂得了符号里的中国,无论是文化寻根、文博旅游,还是日常审美,都会是充满趣味的人文之旅。

1. 四大主题——祥瑞、守护、神圣、人文,展示古人的心灵世界和日常生活图景。

从天地人神鬼说到鳞毛羽昆,四大主题涵盖想象的心灵世界和真实的现实世界,共同构成了古人的生活世界。龙凤有什么祥瑞?牡丹是如何成为花王的?葫芦是什么神器?农民祈祷风调雨顺会拜什么神?读书人逢考必拜什么神?福禄寿三仙是星宿变成的?雷神还能惩罚罪恶?财神是怎么炼成的?除了神仙鬼怪,有哪些人被神圣化了?古代中国有哪些岁时节日及时空想象?

2. 精选能代表中国的100多个符号,彰显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魅力。

老百姓眼中的“中国”是感可亲的,是龙、凤、貔貅、蝙蝠等祥瑞,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牛郎织女、董咏七仙女、八仙过海等民间故事,是春节、中秋节等还在延续的传统节日,是天上、人间、地府的多维空间想象。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是思可亲的,是太极图、八卦图、河图洛书等神奇数字,是孔子、老子、屈原等神圣人物,是琴棋书画等雅致生活。孩子眼中的“中国”是可爱可亲的,是葫芦娃、孙悟空、哪吒等伴随童年的趣味故事。这些习焉不察的符号能唤醒每个中国人的认同感。

3. 近300幅精美图片,“按图索骥”,探寻5000年文化积淀。

读图时代,图像的应用更能直观地了解古代中国。图文互证,每一幅图像也是一个符号,一个个图注就是一个个

小故事、小知识。近300幅图片中有历代古画、考古实物和手绘线图,内容涵盖神仙鬼怪、士人风尚、天文历法、岁时节日、历史人物、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等等。阅读之余,随着图片和图注一览符号里的中国,有识有趣,赏心悦目。

4. 一本书通晓古代博物学。

中西方都有博物学。西方的博物学往往包含动植物、矿物、天文、地理,主要是自然界的事物;中国的博物学,除了自然界的事物,还有人造物及神话传说。本书赅续古人“博物”传统,除“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神仙鬼怪、珍宝物名、人类活动,等等,无所不包,“有图有真相”。

5. 呼应大众的文博旅游热与考古热。

文博旅游与考古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不求甚解地看,只会疲惫不堪,探寻背后的文化则让人乐此不疲。敦煌的风伯、雨师、雷神、火神、四大天王、佛祖、菩萨、罗汉等壁画,三星堆出土的大立人像、黄金面具、金杖、神树,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帛画,各地的汉画像,曲阜孔庙的孔子手势,等等,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文化密码。

6. 发掘高科技、时事、考古等热点的文化价值。

中国首个自建的空间站为何命名为“天宫”?中国发射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器为何命名为“悟空”?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携带的火星车为何命名为“祝融”?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何命名为“北斗”?华为手机操作系统为何命名为“鸿蒙”?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小汤山模式医院为何命名为“火神山”“雷神山”?三星堆出土的“神鸟—神人—神树”有何神秘?读完本书,热爱科技、考古,关心时事的你会更有“文化”。

本书作者赵运涛,笔名赵九九,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教师、文学系主任。在学校开设了“先秦文献精讲”“中国文学与文化”“《论语》品读”“传统文化中的博物学”等课程。其中,“《论语》品读”“传统文化中的博物学”被评为校精品课程。著有《符号里的中国》《点读唐传奇》等。

书摘

神秘三星堆： 原始信仰中的动植物符号

三星堆是什么时期的历史?它出土的青铜人是外星人吗?为什么青铜人的眼睛那么大?三星堆有哪些神奇的动植物?鸟有何象征?神树有何寓意?三星堆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1929年,四川广汉市太平镇月亮湾的村民燕道诚在浇灌农田的时候,锄到了一块石板,发现石板下面有大量玉石器,于是偷偷地、陆陆续续地将这些宝物倒卖。这些造型新奇的古玉先是引起一位传教士的注意,后来为更多的考古界人士所关注。沉睡数千年的三星堆,因为一次偶然,向世人打开了大门。

三星堆得名于“三星村”,“三星村”得名于附近有稍稍隆起的小土堆,人们想象它们是天上的三颗星辰(对应“月亮湾”这个名字,“三星伴月”,于是就有了“三星”这个想象),其实这三个土堆就是古城墙的残留。

三星堆属于古蜀文化。古蜀国很可能是一个延续了三千年至四千年的王国。根据传说,主要经历了五个王朝:蚕丛王朝—柏灌(一作柏灌)王朝—鱼凫王朝—杜宇王朝—开明王朝。《太平御览》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李白《蜀道难》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从蚕丛到鱼凫,属于“茫然”的时代。鱼凫大约在殷商时期,杜宇大约是西周春秋早期,开明已经到了春秋战国。公元前316年,蜀国被秦国所灭。

古蜀人的构成很复杂,有说是古蜀国氏人,后人是至今生活在四川平武、九寨沟县及甘肃文县的白马氏人,有说是舜驱赶的一群人迁徙而来的,有说是夏商时期从外地迁徙而来的民众与本土民众的融合,等等。

《华阳国志·蜀志》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古蜀人是黄帝的孙子颛顼帝旁支后代,古蜀人与我们同属于“炎黄子孙”。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虽然与中原文化有相似的地方,如器物造型与纹饰有夏文化、商文化的特点,但同时也有其独特性。赵殿增《三星堆考古

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一文指出,三星堆文化重视人像及动植物造型,这与中原商周文化注重礼器,缺少人像及动植物造型大不相同。三星堆人像有立像、跪像、坐像、人头像、面具、面罩、眼泡等,动植物像有龙、虎、蛇、鸡、鸟兽、神树、果实等,非常丰富。

先来说说人像。中原文化很少有青铜人像,有一个商代的大禾人面方鼎,已属罕见。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青铜人像,造型极为夸张神秘。

其中一种造型是眼球突出。为何眼睛如此夸张,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一说是图腾崇拜,“眼睛”是古蜀国的图腾。一说是太阳崇拜,天之眼就是太阳,夸张的人眼象征太阳。大立人青铜像头顶花冠的正中,有一个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还有青铜太阳轮形器,大概都是太阳的象征。一说是蚕丛氏的祖先崇拜,《华阳国志·蜀志》曰:“有蜀侯蚕丛,其纵目。”纵目就是眼球在眼眶之外。蚕丛是古蜀第一个王,传说他发明了养蚕,有功於人民,有功於后人,被古蜀后来的王朝当作祖先神来尊崇。(一如周人祭祀自己的祖先后稷,说其种植五谷的技术养活了全天下的人,有功於天下。)出于对他的崇拜,有了对“纵目”即夸张的“眼睛”的崇拜,这种夸张的“眼睛”是祖先神灵的象征。

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三件青铜纵目兽面具。龙晦先生《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认为,这种青铜面具是人鸟合体的表现,体现了鸟崇拜,耳朵类似杜鹃鸟的翅膀,鼻子类似鹰隼一类的鸟。

为何蚕丛氏会“纵目”?有学者说是“甲亢”导致的,这种眼球突出后来就被神化了;还有的说其实是对蚕丛氏眼睛炯炯有神艺术夸张,也就是上古时期人们信仰的“千里眼”。

三星堆最有名的青铜人造型大概要数青铜大立人像了。

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厘米,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此像原型很可能为古蜀王之一。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大巫师,是“群巫之长”,也是“国王”。除了这个祭祀的“指挥者”,三星堆还出土了其他青铜立人像、青铜人头像以及小型人像:服饰有的左衽,有的右衽,发型有的有辫子,有的无辫子,可能是来自不同民族或部落。他们共同构成庞大而有序的巫师集团,垄断知识,占有财富,既是部落的族长,也是通神的巫师,简言之是三星堆神权的实际统治者。

《今注本二十四史》历经20余年已出版13部

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史家注史,校勘精良,注释考究

《今注本二十四史》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已进行了二十余年。总编纂张政烺先生为本书做了奠基性工作,执行总编纂为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赖长扬研究员、孙晓研究员。全国三十余所科研机构 and 高等学府的三百余位史学专家共襄其事。

《今注本二十四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已出版2期,共13种173册,包括今注本《史记》《汉书》《三国志》

《北齐书》《周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史》《隋书》《新五代史》《金史》。预计2024年全部出齐,共600册,总计约1.4亿字。

自出版以来荣获奖项及荣誉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四五”规划重大学术经典研究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20年度重大科研成果(首批7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度“特别贡献奖”(首批7种)、中国历史研究院颁发的“全国主要

史学研究教学机构2020-2021年度重大成果奖”,今注本《史记》2021年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

《今注本二十四史》集二十四史研究之大成,旨在通过校勘和注释,创造出一套能够代表当代学术水准、为史学研究者及普通阅史者提供极大助益的二十四史权威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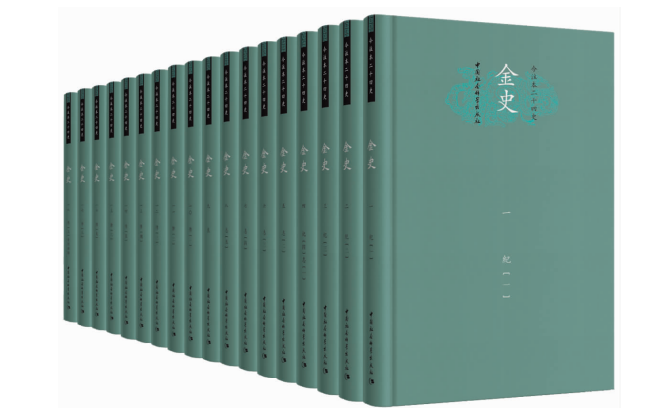
——校勘精良。以“百衲本”为主要底本,辅以多种参校本,全面纠正现行校点本中的校

点错误,重新标点校勘。

——全面注释。传世的二十四史,除前四史有旧注外,后二十史均无注释。《今注本二十四史》以“史家注史”为原则,为全部二十四史进行注释,这在正史整理研究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果荟萃。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注重出土新材料,从而形成一套研究成果与经典史书契合一身、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辉映互证,能够反映当今二十四史研究水准的集大成史学典籍。

《今注本二十四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正史全面注释,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准,融历史文本与历史研究为一体,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完成了古代正史的现代化形式。在致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恰逢其时,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研究,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具有重大意义。



1. 今注本《三国志》(全12册)精装本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杨耀坤、揭克伦校注/定价:1899元

《三国志》记载自汉末至晋初魏、蜀、吴三国历史的纪传体国别史。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国志》选取存世最佳版本为底本,辅以多种参校本,全面纠正现行校点本中的校点错误,形成一套新的校点横排繁体版本。在保证文本精良可靠的基础上,对原书职官、名物、地理、典故等进行系统全面的注释。在校勘、注释过程中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形成一套研究成果与经典史书契合一身、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辉映互证的典籍,注释深入浅出,适合各类读者参阅,为《三国志》整理与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2. 今注本《宋书》(全15册)精装本

(南朝梁)沈约撰/朱绍侯校注/定价:2388元

《宋书》记载南朝宋自宋武帝永初元年(420)至顺帝昇明三年(479)共60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

3. 今注本《南齐书》(全8册)精装本

(南朝梁)萧子显撰/王羲之、张欣校注/定价:1388元

《南齐书》记载南朝齐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共23年的历史。全书原为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包含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

4. 今注本《梁书》(全7册)精装本

(唐)姚思廉撰/熊清元校注/定价:1299元

《梁书》记载南朝梁自武帝天监元年(502)至敬帝太平二年(557)共56年的历史。全书共五十六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

5. 今注本《隋书》(全16册)精装本

(唐)魏徵等撰/马俊民、张玉兴校注/定价:2388元

《隋书》记载隋朝自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至恭帝义宁二年(618)

共38年的历史。全书共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

6. 今注本《北史》(全22册)精装本

(唐)李延寿撰/李凭、靳宝校注/定价:2988元

《北史》记载自北魏登国元年(386)至隋义宁二年(618)共233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卷,包括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

7. 今注本《金史》(全18册)精装本

(元)脱脱撰/张博泉、程妮娜校注/定价:2588元

《金史》记载金朝自金太祖出生(1068)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共166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五卷,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

8. 今注本《史记》(全25册)精装本

(汉)司马迁撰/吴树平校注/定价:3899元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包括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表十篇,书八篇。本次校注以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初印本为底本,选取了学界公认的版本价值较高的十种刻本与底本进行对校,并对难解字词、人物、史事、职官、地理、天文、历法、典制等进行注释。

9. 今注本《汉书》(全28册)精装本

(汉)班固撰/孙晓校注/定价:3999元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自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至新莽地皇四年(23年)共232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卷,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唐代颜师古改为一百二十卷。本次校注以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刻递修本为底本,参校国家图书馆藏宋蔡琪家刻本等三种版本,并广泛吸收历代研究成果,利用考古和新发现的史料,对人物、地理、职官、典制、史事等加以注释。

10. 今注本《陈书》(全4册)精装本

(唐)姚思廉等撰/李天石、张欣校注/定价:588元

《陈书》记载南朝陈自武帝永定

元年(557)至后主祯明三年(589)共33年间的历史。全书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本次校注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汲古阁本、南监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等版本,并汇集诸家校勘、研究成果,结合出土墓志、考古材料,对职官、地理、人物、名物制度、典故、史事等进行注释。

11. 今注本《北齐书》(全5册)精装本

(唐)李百药撰/陈长琦校注/定价:788元

《北齐书》记载自北魏末年高欢起兵至北齐灭亡(577)共50余年的历史。全书共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本次校注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宋刻元明递修本、南监本、汲古阁本、殿本、金陵书局本等重要版本,并参考其他史书及相关墓志、出土材料考订人物、史实,注释人物、职官、地理、典章制度、典故等。

12. 今注本《周书》(全7册)精装本

(唐)令狐德棻等撰/陈长琦校注/定价:988元

《周书》记载了北魏末年战乱、东西魏分裂分治、北周政权盛衰兴亡的历史,是一部纪传体的西魏、北周史。全书共五十卷,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本次校注以《四部丛刊》影印百衲本为底本,互校了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等版本,并吸收历代的校勘、研究成果,对职官、地理、人物、典章制度、史事等进行注释。

13. 今注本《新五代史》(全6册)精装本

(宋)欧阳修撰/纪雪娟校注/陈智超审订/定价:899元

《新五代史》记载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54年的历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世家十卷,十国世家年谱一卷,考三卷,四夷附录三卷。本次校注以百衲本为底本,以中华修订本、宗文书院本、殿本为通校本,并广泛吸收学界的校勘、研究成果,对五代时期人物、地理、职官、礼制、风俗等进行注解,特别是对过去未有注释,难以理解、极易出错的名词进行了笺注考证。